

應將「十二五」支持轉化為動力

楊孫西

在不久前閉幕的「兩會」記者會上，溫家寶總理對香港問題特別是列入國家「十二五」計劃事宜，作出了回應，反映了中央對香港形勢的看法。眾所周知，中央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認真執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嚴格遵守基本法。顯而易見，這次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把港澳單獨列為一章，不僅是應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要求，亦是對港澳長期發展的支持和協助，中央的規劃絕不會代替香港的自身規劃。結合香港最近發生的事情，確有發人深省之處。

揚清激濁

香港決不可能「被規劃」

首先，我們應先了解一下國家的「十二五」規劃的由來與產生的背景。國家是從1953年開始制以五年一個時間段來做國家的中短期規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就簡稱為「一五」。而2006-2010年這個時間段剛好是我們國家提出來的「五年計劃」的第十一個，所以我們也就叫他做「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簡稱就叫「十一五」。「十二五」也就是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它的時間段就是：2011-2015年。「十二五」規劃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十二五」規劃的起止時間為2011-2015年。規劃編制工作大體包括前期調研、編制起草、論證銜接、審批發佈四個階段。在制定程序上，各部委省區在2009年下半年初步完成本領域、本地區的規劃統一匯總到國務院，編制全國的「十二五」規劃，再在2010年下半年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討論建議稿，而後提交2011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上審議通過並付諸實施。

其次，我們來看看香港的城市規劃編制與審批。香港的發展策略由規劃署的專門小組，策略規劃組負責編制。全港發展策略的研究程序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訂立一套主要目的，作為制訂策略及根據各項考核準則評審策略的基礎。第二階段是制訂多項發展方案／選擇和作出評審；各類用地的發展策略和全港發展策略的選擇，將根據正規劃、環境、運輸及經濟方面所訂的各項目標進行評審。第三階段則是訂出改進選擇及分析其成效，然後找出不同改進方案的共同組成部分，以制定最可取的策略。特區政府在每一階段都會徵詢民意。應該看到，國家制定的「十二五」規劃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促進深化粵港澳合作，都需要特區政府制定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才能把握商機，將「十二五」規劃對香港的支持轉化為發展的動力。由此可見，香港決不可能「被規劃」。



■「十二五」規劃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圖為維港景色。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方面具有不少優勢，如背靠祖國、市場經濟體系、資金自由出入、貨幣自由兌換、法治基礎和資訊自由等，因而可推出一些更有力、具體和切實可行的措施，例如吸引在中國投資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來港上市，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業界人士認為，「十二五」和今後二十年，就是要發揮香港服務業的優勢，帶動我們整個中國的服務業有一個快速的增長。目前，美國金融產業有兩萬多億美元，而內地只有八百多億美元。所以，首先要發揮香港的優勢，幫助大陸把金融產業做大做強。今後二十年，金融產業總規模應當趕上和超過美國。

發揮優勢加強與內地合作

「十二五」期間，在人民幣「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方面，香港可以發揮獨特的作用，成為人民幣最大的海外結算中心。現在美元大量貶值，美聯儲向美元注水，那麼這個機會正好是人民幣國際化最好的機遇。在香港這個地方，港幣和美元是掛鈎的，可以自由兌換的；而人民幣和港幣也是可以自由兌換的。這樣人民幣可以通過香港走到全世界去。如果能夠做到這一條，香港對人民幣的國際化，將作出獨特的貢獻。其次，就是在粵港澳的合作中，香港須發揮龍頭作用，用十年到二十年時間，使珠三角周邊的城市群，形成同城化和一體化。倘若用高速鐵路連接起來，加上生產要素優化配置，那麼有可能使珠江口東岸這五個城市，變成全世界的經濟增長極；我們的GDP總量有可能達到兩萬億美元。同時，香港可借助自身在法律制度、配套服務以及國際網路等方面的綜合優勢，向產業高端發展，發展成為國際航運服務中心和國際物流管理中心。

應盡快制定長遠發展規劃

在兩會閉幕的記者會上，溫家寶總理就明確提到，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要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第二，要重視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第三，要努力改善民生。溫總理把「要有一個長遠的、科學的發展規劃」放在香港要注意的首件大事，可見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日前，香港財政預算案引起的連串風波，已說明無論是香港經濟的發展，還是深層次矛盾的解決和民生的改善，都不能再停留在「無長遠的發展規劃」的管治模式中。須知，香港不可能實行高稅制，而社會福利對經濟增長的依賴日深，如果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收入無法帶來社會保障，這就有可能使將來的社會福利缺乏堅實的財政根基而陷入困境。

多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在制定發展規劃方面，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可惜見效甚微。筆者認為，主要是不太切合社會實際，且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六大產業」提出已多時，但恐難以落到實處。特區政府確須轉變觀念，真正改進推動經濟發展的施政之道。當前，最重要的應是如何根據香港的社會實際情況，制訂可行的長遠發展規劃。香港能否把握「十二五」商機，進一步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取得真正的發展，還是要靠港人共同努力。

文匯論壇

A18

慎對核災保港金融穩定

陳鑑林 立法會議員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9級大地震，並引發了東太平洋海嘯，不但人命傷亡嚴重，更直接衝擊了日本的重工業中樞，經濟損失難以估計。如今，核事故態發展仍難以預測，這場災難將對全球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希望政府可以謹慎應對，為全香港市民及早謀劃。

是次災難對金融市場的衝擊，日本股市的體現可謂是立竿見影，日經平均指數曾最多單日瀉近1,400點，下跌近15%。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金融市場的波動，亦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了衝擊。美國道指及MSCI世界指數亦連跌三日，至近日環球股市才反彈；港股則單日最多瀉1,092點或4.68%。隨着日本核危機有緩和迹象，港股出現反彈。但日本局勢仍未明朗，核事故態發展亦難以預測，港股反彈之勢，未必能持續。再加上市場普遍認為，利比亞戰局會推高油價，使得全球股市更加動盪。總言之，現時市場相當敏感，稍有風吹草動都可能有大波動。香港政府須密切留意市場的發展，監測市場的不正常活動，警惕導致任何系統性風險的因素與發展，提高資訊的透明度，發放及時準確的訊息，協助澄清謠言，不要讓謠言有機可乘，保證市場的正常運作。

監測市場不正常活動

另一個讓人擔憂的是匯率問題。雖然日本央行聯合G7其他國家央行進行聯手干預後，日圓匯率相對穩定，本港資金流向暫時亦未見不尋常。但已有中資銀行理財產品設計相關負責人表示，日圓匯率波動，受影響最大的是掛鈎金融市場的結構型銀行理財產品，尤其是掛鈎美元兌日圓匯率的產品，可見市場對日圓匯率存在擔憂。為保證救援及重建有足夠的資金，日本央行又向金融機構巨額注資，市場可能面臨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的衝擊。日圓匯價的波動，將會影響其他貨幣的匯價，為貿易與投資帶來風險，因而當局與業界須密切關注。

事實上，不管日圓升值還是貶值，日本在地震後進行大型重建，必須對外購買各種資源商品，額外的「日本需求」增加了市場需求的不穩定性。從近期石油、糧食、黃金、銅的價格走勢來看，另一輪資源商品漲價潮勢所難免，通脹壓力將會愈來愈大。

另外，日本消費品尤其是電子產品、汽車的短缺，亦將推高有關消費品價格，使香港的通脹進一步升溫，增加輸入性通脹的壓力，特區政府須作好準備，在舒緩通脹方面制訂適時的措施，維持香港經濟與社會的平穩發展。

靈活處理吸納避難金融專才

東京不僅是日本的商業中心，亦是亞太區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日本核輻射問題短期內不可能解決，東京地區電力供應緊張，仍要實施局部地區限電措施，居民的日常生活都不能保證，商業活動更是陷入停滯。不少金融機構都準備撤離日本，或將部分員工調離日本。這些金融機構可能會擴大其在香港的分支，以支援其於東南亞或亞太區的業務。也有一些公司或企業會選擇把在日本的區域總部暫時遷至香港。市場人士估計，當地已有數百名持有歐美護照的金融界人士暫時撤離，還有更多一待簽證及工作證件問題解決，即會移至本港工作。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機遇，不僅為香港增加了金融業的專才，也擴充了香港金融機構的規模，對香港金融業的發展有利。

金管局之前已向銀行發出通函表示會配合，並採取應急的特別安排，若銀行有調配日本員工到港的要求，交齊文件後，入境處約在兩個工作日內可批出臨時工作簽證，金管局亦會加快批出有關專業牌照。政府今次因應緊急情況、靈活處理的做法，值得讚揚。希望政府可繼續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如加強宣傳，提供便利化措施等，爭取更多有利香港發展的人才與企業落戶香港。

反對港鐵加價並非「輸打贏要」

謝緯武 香港國情港事評論社

通脹勢頭猛，港鐵率先加價，拉開公共服務加價潮序幕，交通費用更昂貴，引起社會不安，民怨再升溫。

港鐵作為主要的公共交通機構，去年錄得120億元的巨額利潤。盈利如此豐厚，竟然繼去年13年來首次加價2.05%之後，今年再加幅2.3%，怎不會引起社會嘩然？

港鐵是按2007年10月股東特別大會通過的加可減票務機制，今次連續第二年加價的。按此機制，港鐵票價調整幅度與統計處公布的前一年12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及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的按年變幅掛鈎。去年12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升3.1%，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升1.5%，因兩項因素比重各佔50%，故定今年6月起票價加幅為2.3%。

要承認，加可減機制是曾經經過社會的廣泛討論，經過立法會的辯論，達成共識而定型的。今天發現港鐵利潤豐厚仍要連續兩年加價，而市民在通脹之下苦不堪言，仍然要忍受加價肆虐，說明此一機制大有檢討之必要。有論者認為契約精神要尊重，市民不應「輸打贏要」。

再議養老金「錢從何來」

單仲偕

上月本欄談及「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養老金)(註一)，尤其筆者最憂慮的，是養老金「錢從何來」。讀者反應似乎相當熱烈，既有正面也有反面。香港應否引入養老金，而若要引入的話細節如何，是時候再來一次嚴謹的辯論。

07年底筆者尚任立法會議員，當時預計政府在該財政年度有巨額盈餘，故當年11月與黨內立法會同僚跟曾華華會面提交預算案建議書(註二)時，主力建議政府成立「高齡人口基金」，及早儲備資金應付香港面臨人口老化引致醫療和社會福利開支大幅增加的問題。「高齡人口基金」有兩個主要的財政來源：一、從當年千多億盈餘中撥出500億元一次過撥款作為種子；二、每年外匯基金投資收入一半撥作高齡人口基金的經常收入，預計初期每年約有280億元收入，差不多等於同期政府薪俸稅收入7成半，隨後「錢攞錢」收入還會更高。外匯基金的資產包括用於捍衛港元的「貨幣基礎」，以及多年投資收入累積成的「累計盈餘」，07年兩者總額約為8000億元，當中「貨幣基礎」只需要3000億元，其實5000億元「累計盈餘」並無指定用途。「高齡人口基金」的優點，是利用政府當年一次過巨額盈餘為基礎，再行透過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為基金提供經常收入，從而達到高齡人口基金能不斷滾存為儲備未來應付人口老化的資金，市民毋須為基金供款，政府毋須為基金加稅，但外匯基金仍會繼續滾存資產捍衛港元。

這個筆者設計的「高齡人口基金」收入的模型在20年內累積的資產保守估計可達6000億元，約等於當年利得稅收入的10倍，是極驚人的數額，如果由市民供款來支付的話，相信即使大幅加稅亦未必能應付。然而，相對於人口老化引致的醫療和社會福利開支增長來說，這個基金只能達到減輕日後加稅和供款的負擔，但日後的納稅人無可避

免地要多交稅款或供款。

根據當時的推算，到了2033年，額外醫療開支累積高達4000億元；而同一時間，由於更多長者退休，即使在沒有退休保障的長者當中，只有一半長者領取綜援，一年的額外開支便已逾200億元！由07年起累積的額外開支，肯定是非常驚人的數額。民主黨遞交予財政司的建議書中，便預計高齡人口基金，至多只能應付額外醫療開支至2043年，而不足以應付整個人口老化周期，此後，基金將會用完，除非再有新資源，否則政府必須再找新資源。

長篇大論，筆者想指出的是，香港人口老化已迫在眉睫，香港過去數十年生育率之低領先世界，以致人口老化問題也來得特別嚴重。即使現有醫療服務和福利在未來數十年只按現有的水平維持下去而毫不改進，所需要的財政開支也是天文數字，香港社會要安穩度過這個人口老化的過渡期將會甚為艱難。筆者尤其要強調的，香港的長者將會多至一個地步，即使沒有退休保障的長者中，只有一半人領取綜援，20年後每年額外的綜援開支，按06年的價格也超過200億元！如果要推行養老金，所需的額外資源必然只有多不會少。

養老金的目的是「派錢」，即讓長者受惠能有尊嚴地度過晚年。但在討論派錢之前，我們必先要認清我們如何能「攞錢」、攞到多少錢，才有空間討論可以怎樣派錢。「高齡人口基金」是「攞錢」的方法，可是，按現有的數據，錢運應付基本需要還未足夠，要達到「攞錢」應付養老金的開支，尚待研究。

註一：<http://paper.wenweipo.com/2011/03/21/PL110321005.htm>

註二：<http://www.dphkweb.org/budget0809-ppt.pdf>

世紀風

日本核輻射：部分國民何以自亂？

邱震海博士 風凰街視評論員

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的9級大地震不但引發海嘯，而且也引發嚴重的核洩漏和核輻射。地震、海嘯兩大自然災難同時發生，同時加上人類歷史上第三次核洩漏與核輻射事故，對日本民族和整個國際社會都構成極其嚴峻的挑戰。

華人搶購食鹽亂象值反思

眾多亂象之中，有一個亂象值得華人社會反思，那就是當核輻射擴大大之際，在香港和中國內地出現搶購食鹽的風潮。許多人何以做出如此瘋狂、無知的舉動？其間，有許多可以解析甚至令人深思的層面。

首先，互聯網上有人發放惑惑人心的消息自然是原因之一；同時無論香港還是內地有關部門，面對網絡謠言都未能及時做出反應，釋放讓公眾放心的信息，也是另一個原因。從新聞媒體的角度說，在搶購鹽潮出現的第一時間內，即便政府尚未公佈信息，也應搜集專家的一手意見並及時公佈，以對公眾和政府均起到提示和警示作用。事實上，隨着互聯網的發展，信息傳播正呈現其極其迅速、難以預測和掌控以及日漸個體化的新特點，對這些無論哪個體制下的政府和主流傳媒，都必須予以仔細研究，不然一次搶鹽風潮可能無傷大雅，但未來若發生更大的不可預測危機，整個社會就將陷於極其混亂和尷尬的境地。

其次，從香港和內地公眾的素質而言，這就是一個更值得探討的話題。風潮過後，一些輿論認為公眾從自我保護的角度出發做出此舉，雖略顯幼稚，但本意無可非議；也有不少輿論指出內地公眾缺乏基本常識，其慌張與日本國民大難當前的鎮靜相比形成反差。

兩種觀點均有其合理之處，但都僅指出了問題的一個或幾個側面。就應對災難和危機的訓練而言，必須承認，國人的訓練相對是比較少的，在這方面日本作為地震多發國家，其國民的應對危機的訓練及其練成的心理素質，顯然遠遠超過國人。從中國內地情況來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戰爭危險，國民還經常接受應對空襲和其他戰爭襲擊的訓練，近30多年由於和平環境，危機和災難訓練幾乎全部取消。災難和危機來臨時，國民能否擁有沉着應對的本領，令人打上一個問號。

中國人集體性格的正負兩面

國人集體性格和精神層面，確實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清末大學者辜鴻銘曾用西文出版過一本書，書名為

《中國人的精神》，其中將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歸結為三大特徵：deep,bright, simple，譯成中文是深沉、聰明、淳樸。辜鴻銘的本意是希望向西方世界傳遞中國民族性格中美好、善良的一面，有其準確、傳神的一面；但辜鴻銘的這一描述無意間也可讓人看出國人民族性格中的另一面。

就深沉(deep)而言，國人性格有別於西方人的特徵是靜水深流，含而不露。但惟其如此，中國的許多事物(包括中國政治)很難用西方的邏輯和實證方法予以解釋和預測；深沉和含蓄是美，但也因此而導致陰氣過多，缺乏陽光和陽光之美。而實際上，國人的深沉只是內斂、含蓄和藏而不露，而缺乏真正的思維深刻和穿透力。黑格爾曾指中國缺乏真正的哲學，並稱儒家哲學充其量只是一種為人之道而非哲學。這種指責自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但仔細分析也不無一定道理。相反，從古代的宦官政治到近代的「厚黑學」、人際關係網和「黑箱作業」，都可在深沉的背後找到其集體性格的根源。

就bright(聰明)而言，無人可以否認華人的智商以及整個華人社會的聰穎、勤奮和內在創造動力，但這聰明卻總讓人感到缺乏一種大氣，也許這正是近600年中國幾乎沒有對人類的物質和精神層面有過重大貢獻的主要原因。這種大氣簡單說來就是一種大聰明，而非小聰明；它不是以具體的利益為指針，而是以事物本身的邏輯為遵循對象；在理論上，它願意探究一些諸如「世界從哪裡來，又向哪裡去」這樣的與周圍生活完全不關聯的抽象問題，但惟其抽象才顯深刻；反映在民眾的性格上，它可以讓人在閒暇之時，不僅僅以娛樂和休閒開發時間，而是願意坐下來談話。對，只是談話，談一些與自己沒有直接關聯的事情，談一些需要邏輯思維和抽象能力的事情。許多華人電視台無法容納長時間的深刻談話節目，抑或即便有也只是膚淺的陣營對決或謾罵，就明顯證明了這一點。

就simple而言，這個英文詞一般均譯成「簡單」，但辜鴻銘將其譯成了「淳樸」，以冀展現國人民族性格中善良、美好的一面。淳樸，意味著為人憨厚，雖然其間不乏有些小心思，但整體上是善良的。但無論是憨厚還是善良，其潛台詞似乎都是考慮問題不多。這裡說的考慮問題不多，不是指小心思，而是指大聰明，大智慧。因此，無論在實際生活還是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國人似乎總難以擺脫情緒，直達問題的核心。

但同時，國人的這種性格也時常讓人感到性情中人的感性、可愛的一面。因此，許多過中中日兩國的西方人士都有體會：初到日本，會對其秩序井然頗有好感，但時間久了就能感到其社會和人情的冷漠；而初到中國，每每不習慣於其秩序的亂象，但時間一久，則會感受到中國人的淳樸和人情。

國人的這些集體性格特點，有其自身群體基因的先天原因，也有後天因素。所謂後天因素歸納起來就是：中國歷史上始終沒有經歷過大規模的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過程，因此其精神狀態往往呈現混沌未開的處女地或未經驗琢的玉器的特徵。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的國民，不應再讓其集體性格或精神狀態停留在「未經雕琢的玉器」的狀態，不然未來的道路將會走得很盲目和充滿風險。